

北大未刊讲稿

苏秉琦 著

戰國秦漢考古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大未刊讲稿

苏秉琦 著

戰國秦漢考古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国秦汉考古 / 苏秉琦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325-7210-6

I. ①战… II. ①苏… III. ①考古—研究—中国—战国时代②考古—研究—中国—秦汉时代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2190 号



战国秦汉考古

苏秉琦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240,000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7210-6

K · 1851 定价: 5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苏秉琦学术笔记的整理

——代序

大约在 2008 年,郭大顺先生就和我联系,说苏秉琦先生的一些笔记本存放在他那里,非常有价值,应当整理出来。苏先生的家人,苏恺之先生也有此意。我当即回答北大愿意做这件事。苏先生是北大考古专业的第一任主任,领导了专业创建和发展。因此在这件事上,北大考古专业也即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责无旁贷。但这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仅需要整理者认真负责,还要对学术史有相当的了解。因为一时没有合适人选,事情办得就有些拖沓。不过在这期间,就此事和大顺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此后,学院的刘绪先生将于 2012 年引退。刘老师学问好,人品和做事兢兢业业、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更是有口皆碑,恐怕是担纲整理苏先生学术笔记工作的最佳人选了。看准这个机会,我试探着和刘老师商量,请他当此大任。其实即便是退休,像刘老师这样的专家学者也是闲不下来的,还会有大量的学术活动和研究任务。所以,我在和刘老师谈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但刘绪老师满口答应下来,态度非常明确:苏先生无论学术还是为人,都是我们后辈的楷模,苏先生的笔记是宝贵的学术遗产,应当整理出来。更重要的是,苏先生是北大考古的创建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吃水岂能忘记掘井人!

此后的工作就非常顺利了。2012 年 3 月,苏恺之先生和我们签订了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整理、编辑和出版苏秉琦先生学术笔记的协议、研究工作计划,成立由苏恺之、郭大顺、高炜、刘绪、徐天进和我组成的编委会。3 月 8 日,我代表学院接受苏恺之先生送来的苏秉琦先生的笔记 96 本、秦汉考古学讲义笔记 10 本、资料 4 袋。

2013年5月3日和6月14日,苏恺之先生又两次送来于苏先生旧物中整理出来的若干教学工作的记录,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陕西西安做的田野考古调查资料。

接受第一批资料后,对原件编号、扫描等前期工作随即开始,阅读资料和对其中分类也以刘绪先生为主开展起来。之所以要做些分类,是因为苏秉琦先生的笔记年代虽然清楚,但和夏鼐先生的日记体裁不同,苏先生的不是日记,称之为笔记更为贴切,都是因事而记,而不是每天的流水。记录内容包括教学科研的工作记录、读书笔记、发言讲话要点等,最多的是他老人家随时随地看到、得到的考古资料的记录和分析,包括大量手绘的器物图,有的还按照形制排比开来,体现了苏先生的学术思考。此外还有照片、信件若干。这就决定了苏先生的这批文献只能大体按照年代,主要是按照类别整理编辑,而不能依从《夏鼐日记》的模式。说到这里,顺便讲到高炜先生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即有一次高先生听到夏鼐和苏秉琦两位先生谈天,以佛教中的大、小乘自比彼此的特点,但又同在佛门之中。话一到此,两位老先生开怀大笑,以自己发明的这个比喻之恰当而自得,顽皮之情溢于言表。仅不记日记一事,亦见苏先生风格之一斑。

也正缘于此,对苏先生留下来的笔记文献的整理是颇有难度的。这些文献中最早一本可能早到了1938年,最晚到了1994年,历时半个多世纪,涉事亦多。如何从中梳理出个脉络来,是最困难的地方。且不说苏先生的笔迹文字小而清秀,直到晚年都是如此,很多又是铅笔书写,时间久了,字迹有的已经漫漶不清,光是正确辨认出这些记事中的人名、地名,就不是件轻松的事,往往需要花很多功夫考订。所以,若非刘绪老师这样满腹掌故、又极其细致的人不能胜任。鉴于这些情况,编委会在初步整理的基础上讨论决定,编辑工作首先从苏先生上个世纪在北大讲授秦汉考古课程时主持编写秦汉考古教材的相关文献开始。因为这

部分文献的内容范围明确,又成体系,从编辑工作角度容易把握。有关这部分文献的整理过程,刘绪老师有专门的文字交代,兹不赘述。

到2013年底,这个部分的编辑整理完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听说了北大整理苏先生笔记文献的事后,表示非常愿意承担出版任务。目前,编辑好的文稿已在出版社。在书稿编排付梓之前,我受命写了这篇文字,借此向读者交代整个事情的原委,同时也告知大家,整理编辑苏先生笔记文献和出版的工作还在继续。

苏秉琦先生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考古学的事业。他的学术成就高山仰止,他的学术思想至今仍启迪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些,在苏先生已经发表的论著中,在诸多对苏先生的纪念文章中,都有很好的体现。然而,阅读、整理和编辑苏先生这批尚未公开的笔记文献,让我们对苏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1952年,为了顺应国家经济建设全面开展而产生的发展文物考古事业的迅猛需求,北京大学在文化部、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帮助下,于历史系内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的第一个考古专业,苏秉琦先生受科学院考古所委派,来北大帮助办学,出任考古专业的第一任主任。从此,苏先生就和北大考古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这是中国高校的第一个考古专业,如何建设全无经验参照。其创业艰难,对于过了60年以后的我们来说,既可想而知,又根本无法体会其中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1998年,郭大顺先生和高炜先生因为给《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编写《苏秉琦年谱》,请学校提供了苏先生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的情况。时任考古系主任的李伯谦先生把任务交给了我。为此,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学校档案馆查阅了这个时段历史系所有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的档案记录。但令人失望的是,因为档案制度不健全,保留下来的文件不是很多,也不系统,和苏先生及考古

专业有关的就更少,对于编写先生的年谱帮助不大。但即便片言只语,从中还是多少保留了一些当时专业建设的信息,可以大致了解到苏秉琦先生、宿白先生等如何殚精竭虑地开办专业的情形。苏先生的笔记中也保留了这方面的部分内容,如当时的教学改革会议记录、如何为学生选定考古实习地点,等等。这些记录可以和档案资料互相补充。此外,2011年,为了筹划北大考古90年庆典,我们启动了一项广泛采访北大历届毕业生的“口述史”计划。从那些50、60年代就读北大的先生们的口述回忆中,我们收集了大量信息。几种资料缀合起来,专业创建时期的苏秉琦先生的形象就大大丰满起来。据此我们了解到,包括田野考古实习在内的课程设置与落实、教材建设、队伍建设是那个阶段的工作重点。为此,苏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精力,即将出版的《战国秦汉考古》,即为当时教学工作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便是现在,按照断代设置的《中国考古学》和包括田野考古实习在内的考古学技术方法的课程,尽管这些课程的具体内容不断有所损益,却仍然是今天考古文博学院考古专业课程两个最基本的构成板块,甚至就连中国考古学段落的划分,竟都是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已经规划设计好了的。因此可以说,正是苏先生的领导和亲力亲为,奠定了北大考古教学体系的基础!

1982年,北大筹划建立考古系。为此,俞伟超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特地到西直门内的苏宅拜访,请教苏先生如何建系的问题。苏先生娓娓道来,严先生笔录了谈话的主要内容。在谈话中,苏先生充分肯定了建立考古系的必要性,指出,当前学科和队伍都处在转折时期,对于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的建设,北大要起更大作用。在这里,苏先生所指的学科和队伍,当然不仅仅是北大,而是整个中国考古学界。但他对北大寄予厚望,希望北大能够带个好头的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对于考古系的建设,苏先生特别强调了教师队伍的重要性,在现有队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和形成梯队,要争取《前出师表》的目标(兵强马壮、人才济

济),警惕沦为《后出师表》中人才匮乏的窘境。在如何保持和提高水平方面,苏先生指出,教学和科研两者固然都很重要,但更应当通过加强科研来带动教学。应当有重点科研项目,并制定近期和长远的教学计划、科研规划。苏先生说,过去北大在这方面是有些经验的。我想,苏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经验应该是指自1959年在洛阳王湾以来的历次教学实习中得到的心得体会。这些实习将明确且关键的研究课题与教学结合起来,既提高了专业的研究水平,促进了北大在中国考古学体系上的建设,同时也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学术人才。苏先生还设想,今后的学生培养,不必扩大本科,而要扩大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和进修生。此外,苏先生还谈到,要利用好现有的物质条件,进行一些教学科研设施的建设,尤其要加强实验室和田野考古实习基地的建设。这些意见都直指学科建设的关键,若非对办学有深刻了解和思索,若没有深厚的经验积累以及对教学与社会大环境关系的准确把握,是提不出来的。这个谈话记录,至今仍是我们进行学科建设的指导纲领。这些年来,我们在学科建设上采取的一些举措,如加强科技考古实验室和田野实习基地建设,以开展重大科研课题带动教学水平的提高,想方设法扩大博士生培养规模,等等,皆源自苏先生办学思想的指导。我做了几年考古文博学院的院长,在这方面,体会最为直接,恐怕是有些发言权的。

由于北大考古专业是国内高校的第一个考古专业,此后其他陆续建立的考古专业,都多多少少地参考了北大的经验、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苏秉琦先生也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谈论苏秉琦先生的学术贡献时,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是苏先生如何高屋建瓴地引导了中国考古学。他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一时间指导了几乎是整个学术界的方向。他重建中国史的倡议和有关中国文明的论述,又不失时机地将中国考古学引向古代社会研究的更深层次。

而他早在 1993 年北大举办的“迎接 21 世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就提出“从中国看世界,从世界看中国”,即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任务,我们今天益发感觉到实现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我倒是经常思索一个问题,苏先生如此高远的学术洞察力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苏先生的学术笔记提供了部分答案。

苏先生学术笔记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对考古资料的记录和分析,其中一些大概是在考古工地、库房观摩资料时自己画的器物草图,通常旁边还有对这件器物的笔注,更多的是自己画出的表格,将器物排列进去,显然是对一批器物进行类型学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案例很多,上自新石器文化,下至汉唐时期,以中原地区居多,却各地皆有,足见苏先生用功之深、之勤奋。在收到的资料中,还有一份几近完整的上个世纪 50 年代初西安附近的调查报告稿。这是由苏先生领导的田野项目,简略的工作汇报和调查简报分别发表在《科学通报》(2 卷 9 期,1951 年)和《考古通讯》(1956 年 2 期)。就我观察,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很长时间内似乎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俞伟超先生和张忠培先生为《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撰写的《编后记》中着重介绍了这项工作。记得严文明先生在课堂上也对我们说:你看,苏先生凭着一组地层关系,就把关中地区仰韶、客省庄二期和周文化分得清清楚楚。要知道,在 50 年代初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这个认识是多么的精彩和不容易!不过,我估计这几位先生如此推崇这篇简报,完全是出于他们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和对学术史的深刻理解,但他们未必看到过调查报告的原稿。这次由苏愷之先生送来的是一份轮廓大体完成了的正式报告稿,约有数万字的份量和已经编排好的线图以及一些照片,文字部分还分第一稿和第二稿。由此可知苏先生对这批调查材料的整理下了很大功夫。从包裹这些资料最晚的一张报纸看,整理工作也许一直持续到了 1958 年。在整理作业中,苏先生将今天的类型

学的“型”、“式”、“组合”等关键概念运用得非常成熟。在精确的类型学分析基础上,报告远不止将西安地区的文化分了三期,对每一期还有更细致的分解。最后,报告还尽可能与那个时期的河南、甘肃等周边地区为数尚不很多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比较,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陕西龙山文化的特点性质等问题提出了看法。即便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这些苏先生学术笔记整理的参与者们仍不禁惊叹这些观点的准确和深刻,惊叹苏先生研究方法的逻辑性和纯熟老道。仍然回到严文明先生那句话的语境:要知道,在田野考古工作和考古资料积累都很不充分的50年代,取得这些成就,是何等的不易!上个世纪70、80年代之交,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文化的格局、各文化传统区块的历史地位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等进行了全局的和高度的概括,进而将这些文化现象上升为“满天星斗”或“多元发展”的历史观,对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苏秉琦年谱》把西安调查成果评价为区系类型思想的“早期萌生”。但我目睹了苏先生笔记之后进一步认为,就研究方法、研究思路而言,早在50年代,苏先生的区系类型思想已然很成熟了,唯一需要等待的,是伴随时光流动,各地考古资料的增加。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学习苏秉琦先生学术笔记之后的两个主要心得。苏先生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在对苏先生学术笔记的整理过程中,我们更深切体会到,苏先生深邃和灵动的学术思想火花的原始跃动就隐藏在这些貌似散乱的笔记之中。相信不同的读者,定会有自己的心得、收获。因此,将这些笔记尽快整理和发表出来,还学界一位更加真实丰满的苏先生,是一项特别有意义的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赵辉

2014年2月26日

整理说明

自 1952 年北京大学创办考古专业以来,苏秉琦先生作为第一任考古教研室主任,除主持教研室工作外,还亲自讲授“战国秦汉考古”。2012 年,苏先生家属将先生生前保存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委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整理发表。

经整理和多方考察,可知苏先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课始于 1953 年,终于 1965 年。这期间,除 1962 年至 1964 年俞伟超先生参加讲授外,全部由苏先生讲授。在 1954 年及以前,尚无“战国秦汉考古”课,战国秦汉部分归入“中国历史考古学”课讲授,1953 年,苏先生开始讲授其中的战国秦汉部分。1956 年,“中国历史考古学”课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三门课,其中之一便是“战国秦汉考古”,由苏先生讲授。因此,苏先生是第一位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讲授“战国秦汉考古”的教师。

现存与苏先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有关的材料可分两类,第一类是苏先生自己撰写的讲稿;第二类是在苏先生主持下由多人撰写的教材。在苏先生保存的第一类材料中,比较完整的手写讲稿有三份,分别完成于 1959 年、1961 年和 1965 年,其他年份的都不太完整。

第二类材料——正式教材,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的特殊环境中完成的(详下文)。当时考古教研室先后两次组织高年级同学与教师共同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苏先生作为考古教研室主任,责无旁贷地成为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的主要负责人,并主持和参加了其中第四编《战国秦汉考古》的撰写。第一次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教

材完成于1958年9月,11月刻印成册,以下称之为58版《中国考古学》;第二次编写的《中国考古学》教材完成于1960年初,7月铅印成册,以下称之为60版《中国考古学》。

经过对苏先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历年讲稿及《中国考古学》教材形成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从北京大学设立考古专业以来,最初十多年的“战国秦汉考古”课是苏先生讲授的,他不间断地及时修改讲稿,组织并亲自参加编写教材,为编写第一部《中国考古学》教材作出了贡献,为战国秦汉考古教学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可惜以往发表的苏先生的论著中,却未涉及这一方面。

在苏先生有关战国秦汉考古的历年讲稿和教材中,经过对比,以60版《中国考古学》中的战国秦汉考古部分最为系统、规范。虽然苏先生每次讲课时都另有讲稿,但多限于增补新的材料和新的认识,尚欠完整。苏先生自己于20年后记述自己学术经历和主要研究成果时,也将60版《中国考古学》中的《战国秦汉考古》列入其中。因此,我们将这部分编辑出版,以彰显苏先生在这方面的学术贡献。

不过,60版《战国秦汉考古》教材的形成有一个特殊过程,一方面与之前苏先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撰写人还涉及到当时的学生与其他教师,这里有必要将此过程予以梳理,从中也可看出苏先生发挥的主导作用。

以下以时间早晚为序,进行简要梳理。

1952年,苏秉琦先生受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委派来北京大学,与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共同筹办考古专业。同年12月23日,在北大文史楼召开考古专业第一次工作会议。会上,除苏先生报告考古专业筹建工作情况外,还宣布考古教研室成立,因向达先生已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等职务,遂由苏秉琦先生兼任教研室主任。

按照考古专业筹建期间对教学计划的安排,苏先生还是三门课程

的教学小组成员。此三门课程及教学小组成员分别如下^①：

一是由夏鼐先生主讲的“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方法”。教学小组成员有梁思永、郭宝钧、苏秉琦。

二是郭宝钧先生主讲的“中国历史考古学”，教学小组成员有陈梦家、唐兰、曾昭燏、苏秉琦。

三是向达先生主讲的“中国考古学史”，教学小组成员有张政烺、夏鼐、苏秉琦、阎文儒。

1952年，“中国历史考古学”由郭宝钧先生讲授，到1953年，“中国历史考古学”则改由郭宝钧、苏秉琦和宿白三位先生讲授，其中苏先生讲授战国秦汉部分，这是苏先生最初为本科生讲授战国秦汉考古，惜讲稿无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料室存有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各课教学进度表（图一），上面标明“中国历史考古学”第一单元殷商和第二单元周代由郭（宝钧）讲授，讲课时间是第1—9周；第三单元秦汉及其以后考古分别由苏（秉琦）、宿（白）、安（志敏？）和闫（文儒）讲授，讲课时间是第10—17周。第18周考试。苏先生应该讲的是秦汉部分，对此，52级考古专业学生笔记可以为证（图二）^②。约与此同时，苏先生还为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讲授“秦汉考古”^③，现存有第二届（1953年）和第四届（1955年）训练班《秦汉考古》油印本教材（图三、图四），以及训练班学员课堂笔记（图五），其中“汉代物质文化”部分由王仲殊先生讲授^④。

^①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五十年（1952—2002）》，2002年，未刊稿。有关内容多采自此书。

^② 依北京大学52级王世民先生上课笔记。经向王先生核实，汉唐部分由苏秉琦和宿白二先生讲，苏讲战国秦汉部分，助教是吴荣增先生。当时还发过一些讲课大纲等材料。

^③ 从1952年8月至1955年10月，共举办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办。

^④ 1954年，由夏鼐先生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主讲“考古学通论”，共十五讲，参讲人还有裴文中和王仲殊和宿白先生，此三位各两讲，其中王先生的两讲为“汉代物质文化”（上、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存有铅印本，为单庆麟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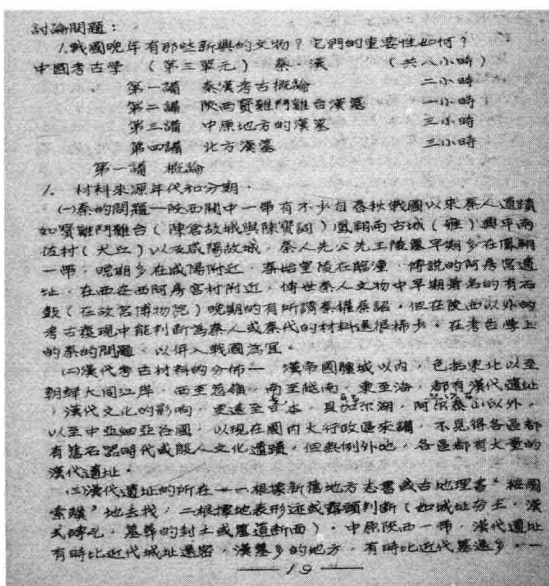


图3 1953年第二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考古学》秦汉部分油印教材首页（王去非先生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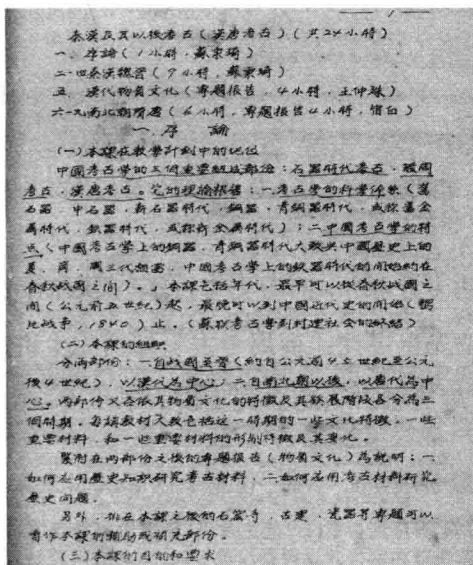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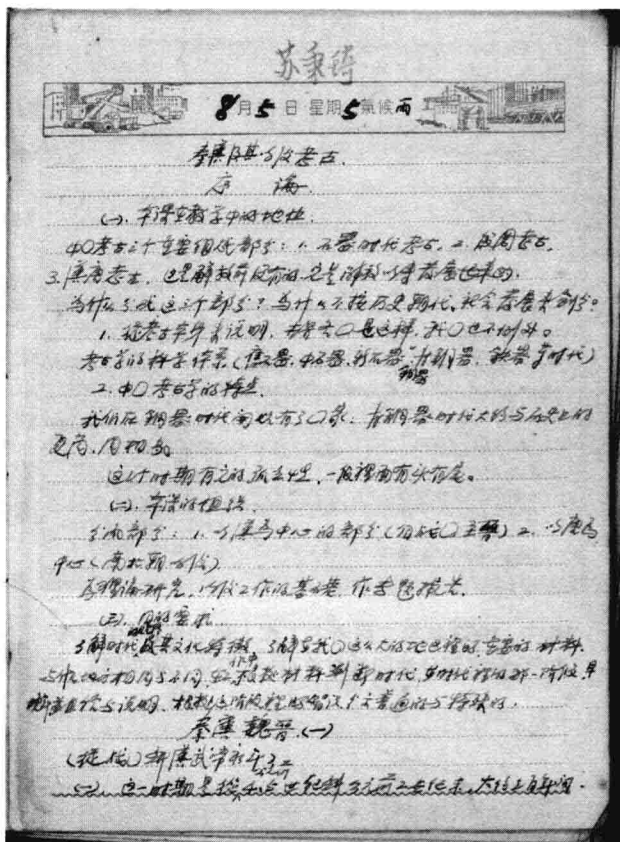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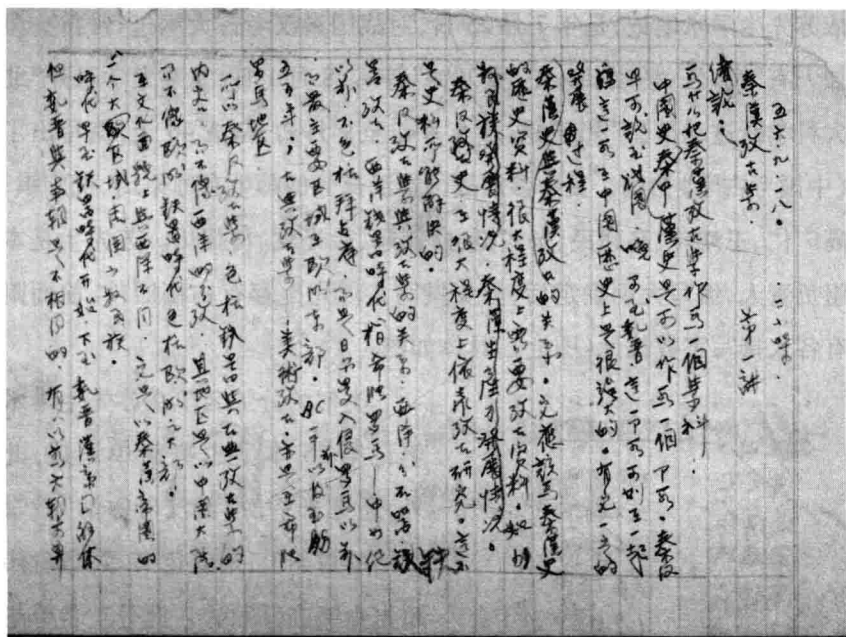
图4 1955年第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中国考古学》汉唐部分油印教材首页（何乃汉先生捐赠），其中序论、秦汉魏晋部分，苏先生讲10小时，王仲殊先生讲4小时；南北朝隋唐部分，宿白先生讲10小时。



图五 第四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何乃汉先生笔记 (1955年记)

1956年,考古专业原“中国历史考古学”课取消,分置为以下三门课程,分别由三位先生讲授:“商周考古”,邹衡先生讲;“秦汉考古”^①,苏秉琦先生讲;“隋唐考古”,宿白先生讲。本年度“秦汉考古”讲稿亦

^① 1953年,郭宝钧、苏秉琦与宿白三先生合讲《中国历史考古学》,郭讲商周部分时,周代包括战国部分。而苏秉琦在紧接着讲授秦汉部分时,亦从战国开始,也包括战国部分。此后,战国部分一直和秦汉部分放在一起讲,在具体称谓上,时而《战国秦汉考古》,时而简称《秦汉考古》。这里所谓《秦汉考古》亦包括战国部分。何以把战国部分从周代析出归入秦汉?主要是受“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概念的影响,当时把战国时期划归铁器时代。《隋唐考古》实际也包括南北朝与宋元考古。



图六 53级贾洲杰先生“秦汉考古学”课堂笔记首页(1956年记)

无存,依53级考古专业学生笔记可知讲授内容(图六)^①。

1958年春,应教研室主任苏秉琦之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尹达先生向北大考古专业师生作报告,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口号,产生了热烈反响^②。随着举国上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考古专业师生在“批判资产阶级考古学”的同时,还提出撰写贯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中国考古学》的任务,由教师和高年级(53、54级)同学共同参加。据讨论意见,将拟议中的《中国考古学》分成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战国秦汉时期、南北朝至宋元时期和资产阶级学术批判等六个部分,参与师生亦分成六个撰写小组。

① 见53级贾洲杰先生“秦汉考古学”课堂笔记。

② 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又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五十年(1952-2002)》,2002年,未刊稿。